



辛亥革命的价值与启示

师泽生 林 毅

摘 要：辛亥革命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重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开始了根除封建专制主义消极影响的进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预演和必要过渡阶段。辛亥革命的实践，一方面证明了只有由中华民族自身主导的革命才能救中国，同时也证明了实现现代化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扫除国家层面的制度障碍。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就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辩证否定中不断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政治发展；现代化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此为端点，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帝制走到了尽头，力图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开始尝试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提供的全方位改造社会的经验为范本，扫除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探索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和建设方案。虽然由于种种时代条件的局限，辛亥革命并未能完成其所有的革命目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就此将国家带上统一富强之路，但它毕竟标志着中国政治史的发展从此走出了千年来治乱循环的局面，迈出了从专制主义向民主政治、臣民政治向公民政治转变的第一步，也正是以吸取其成功经验和分析其教训问题为前提，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逻辑线索上看，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同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前后贯通、不可分割的一段完整历程。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对辛亥革命的价值与启示作出客观、系统的总结与评价，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认清中国近代革命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也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

就辛亥革命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其后果的直接积极意义及其带来的相关启示两部分内容。具体而言，其直接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日益陷入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疯狂掠夺和侵略的悲惨境地，当时中国的政治发展除了要解决一般意义的为国家政治系统提供大众支持的社会化过程和为促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建立制度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促成社会成员在价值、态度、认识和期望上的重大变化等问题之外，还包括了首先瓦解顽固的封建统治权威和秩序、重建政治共同体认同的重要任务，而这一任务的起点就是要在政治领域内实现根本性的变革。

在政治制度方面，辛亥革命在政治变革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打倒了封建帝制，

这不仅仅是一种对统治权威合法性基础的重塑,更代表了新的共和政体对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全面胜利。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①。自辛亥革命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②成为一种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这就保证了中国革命在政体革命方面的彻底性,使得任何试图重建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复辟图谋都难以最终得逞。作为对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的一种否定与超越,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共和制政体,从而打破了由极少数剥削阶级上层精英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规划了此后中国政治革命与发展所遵循的基本政体原则。此外,辛亥革命在建立政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等现代政治制度方面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发展由此开始逐渐摆脱封建政治传统的影响,从而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跨越式发展。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政治统治秩序的特征表现为建立在广大臣民无条件地服从封建君主最高政治权威基础上的封建大一统。近代以来,这种具有鲜明人治主义色彩的政治权威及支撑其的整个统治秩序不仅严重地束缚了中国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步伐,而且在面临内外交困、统治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也已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辛亥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以专制君主拥有不受约束的最高政治权力为特征的封建统治秩序,以推翻封建专制中央政权在局部地区的统治为起点,进而瓦解整个封建一统的政治秩序,在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③。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者们还以彻底否定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基础为条件,引入了公共生活领域和“国民”的概念,这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此不再依托以臣民政治文化为载体的消极被动的政治认同,而是开始在继承了大一统传统和确立现代公民身份的基础上重构出对新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④。

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由传统专制统治政治形态向现代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其具体政治目标包括了确立统一政治共同体内权威的合法性、促成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和政治结构的分化、实现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高效性等^⑤,但这些目标的达成又不纯粹是政治领域革命的结果。辛亥革命所引领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变革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进步的有力支持,体现出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政治变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仅限于政治领域的革命之间的显著差异,也为中国此后开展更加波澜壮阔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两条根本对立但又保持着微妙关系的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都延续了辛亥革命全方位革命的基本思路,只不过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不足以担负起领导和推动更深层次革命的重任,才使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选项。

(二) 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

使民主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通过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和观念体系开始被系统地引入,从而使民主政治的发展成为与拯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同步演进的过程。

首先,辛亥革命将公民权利思想的引进作为民主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并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以政治身份和权利不平等为前提的封建等级制并非没有受到过理论和实践上的质疑和挑战,但直至辛亥革命之后,追求平等、自由权利的人们才第一次明确地运用一套与专制主义截然对立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动摇专制主义的正统地位。以确立民主政治的正统性地位为基础,辛亥革命将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事业同发展民主、扩充民权、改善民生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突破了以往改良主义者和农民阶级革命者寄望于封建专制君主实行仁政思路的局限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346页。

②参见《同盟会革命方略》。

③高路:《辛亥革命:摧毁封建一统与追求现代统一的开端》,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④陈永森:《辛亥革命时期公民权利思想的启蒙》,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⑤张永刚:《试论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系》,载《鄂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性,使民主政治的发展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建设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次,辛亥革命时期民主思潮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几乎完全抛弃了维新派“托古改制”的外衣,也不带有任何宗教神学色彩。革命的领导者依据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法权学说以及进化论的观点,在理论上论证了封建君主政体存在的不合理性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还以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存在的合理性,论证了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必然性^①。简而言之,以辛亥革命为起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即:从“君权”到“民权”政治文化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政治文化的转变,从“消极冷漠”到“积极参与”政治文化的转变,从“等级秩序”到“平等主义”政治文化的转变。虽然就其后果而言,辛亥革命并没有最终重塑出一种与新政治秩序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其对于促成从封建传统政治文化到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变仍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再次,由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认识到民主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主权在民,因此革命的结果也直接扩大了人民政治参与的领域和范畴。以辛亥革命为起点,至少在理论上,来自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人民群众开始享有较为自由、平等和广泛参与政治事务和国家管理的权利,相对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政治权力仅为极少数封建统治精英所垄断的情况,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进步。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民主实践,首先就是以塑造一种迥异于封建社会普通大众对于政治事务无权、无力、无兴趣也无意识参与的全新政治形态为主要标志的,也正因为此,在中国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选举民主的因素始终无法完全压倒甚至是取代参与民主的因素,从一个更长的历史周期看,这也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基本特征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复次,辛亥革命所进行的民主制度的创制实践对后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民主建制过程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辛亥革命所创立的民主制度加以批判性继承的结果。如把革命的成果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是辛亥革命超越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特征,也是决定其影响远远超过其具体成果时空范围的关键所在。此外,在革命的后续发展阶段中,资产阶级革命者还越来越意识到建立现代政党制度,以此作为贯穿代议制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组织制度轴心的重要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直接受到了代表更先进生产力和政治组织形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和支持,这实际上也成为一段时期内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组织和制度基础。

(三) 作为挽救民族危亡运动的新起点

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秩序,不仅依赖于其政治统治体系,而且也对应着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184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与原先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开始塑造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阶级。由于这种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结构整体必然会处于一种明显的断裂状态。一方面,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封建统治阶级力图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诸如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新兴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当这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的矛盾与冲突、分化与重组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通过革命的形式荡涤旧社会结构的残余,而辛亥革命恰恰就在推动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②。

就其直接结果而言,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地改变1840年以来形成的非常态的社会结构,但它毕竟标志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受害于不合理政治秩序的阶级阶层,开始尝试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面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以瓦解封建地主阶级及帝国主义代理人政治统治的方式启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独立发展的进程,摆脱不合理社会结构的桎梏,使各阶级阶层能够在一个符合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合理社会结构中各得其所。相对于此前生产关系缓慢演进的过程而言,辛亥革命是一种跨越式的突变,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在内外压

^①蔡文成:《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载《长白学刊》2011年第1期。

^②林毅、张亮杰:《结构调整,深层变革——新中国的社会结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力作用下不断过渡重构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变革起点,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带来的实质性改变,更在于其为各新兴阶级所展现的改变自身地位命运的政治愿景。

在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基础的同时,辛亥革命全面批判和否定了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家族制度、宗法制度和封建纲常传统,第一次系统地将现代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法制原则和社会生活新风尚带入了中国社会,以其为起点,一股全面革新的风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随着公民意识、民主观念、自由思想等日渐深入人心,一种有别于封建秩序基础上的新型政治主体间关系也开始孕育成形。以辛亥革命为端点,中国人开始逐渐告别那种以完全拒斥或全盘照搬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的时代,在对本国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比较、认识和选择的过程中,以改良主义、国粹主义思想为代表的抱残守缺的思潮和以全盘西化思想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都开始在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日益完善的各革命阶级成员那里失去了市场。作为近代以来反思封建主义传统思潮的自然延续,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革命前后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异常活跃更是对革命本身起到了直接的配合作用。相对于此前的历史时期,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革因素以更快的速度积累、沉淀,并在38年时间内又陆续推动了两波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就加速了中国革命阶段性超越成果的积累,缩短了经由主动变革手段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不断推向前进的周期。

(四) 重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开始了根除封建专制主义消极影响的进程

正如上文所述,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特殊性就在于其重塑新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社会化模式的过程与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过程。1840年以来,各阶级阶层的爱国志士们曾经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了不懈努力,尽管这些斗争屡受挫折,但从每一次失败中总结的经验积累都推动着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着实现第一次质的飞跃的方向发展,而辛亥革命正是这次飞跃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标志。以其为分水岭,爱国者们终于彻底抛弃了对封建统治阶级残留的幻想,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蒂固根深、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大树上是不可能自动长出现代政治模式的果实的,要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首先在政治上坚决地打倒封建主义的统治。因此,挽救民族危亡运动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就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民族革命对内部分的任务也愈发明晰起来。

同时,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也在于革命者们不仅需要克服传统政治的消极影响,而且还必须同时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这就决定了中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的进程必然是与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持同步的。对这一重大国情的认识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早期人们现代化努力的方向、方式选择及其命运。直至辛亥革命发生,革命者们才自觉地意识到“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这一道路的价值并最终将其付诸实践。因此,尽管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就其客观结果而言,打倒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封建主义代理人,也就是极大地打击和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政治基础,反封建革命大门的开启也就意味着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即将被提上议事日程。正是以这一受到时代条件限制的过渡阶段为中间环节,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发展链条,这也正体现出辛亥革命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所在。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②这正是对辛亥革命适应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需要的最大肯定。

在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代理人的同时,辛亥革命也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掠夺起到了直接的遏制作用。尽管出于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原因,辛亥革命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将帝国主义势力逐出中国的革命主张,但辛亥革命所解放的那部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代理人统治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人民、激励人民的过程,通过在曾经貌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563~5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页。

似坚不可摧的封建反动堡垒上打开缺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日益觉醒。辛亥革命后一代代革命者开始了与帝国主义势力直面对决的斗争,直至抗战胜利、新中国建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终于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民族危机,开始以自信的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无须讳言,辛亥革命作为民族革命的性质当然首先是体现在其反对清政府统治、恢复汉民族主体性地位的口号上的^①,但就其实质而言,它所针对的并不是特定的少数民族,而是那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代理人的封建统治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希望建立的是一种中华民族范围内各民族平等互利、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所启动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阶段中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更符合平等、自由精神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以此为起点,中国革命与现代民族主义觉醒的相得益彰最终开创出了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此外,由于辛亥革命肩负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就决定了在它所开创的中国政治发展新纪元中,对国家和公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有别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基点、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对立的模式,从长远来看,这也为反思和超越为传统自由主义思路所桎梏的西方政治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条件。

(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预演和必要过渡阶段

20世纪中国主要的政治变革选择以暴力革命为主要形式具有必然性。从根本上说,对改良和革命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少数精英的主观意愿,而是受到所处历史趋势、历史环境及其所能提供的最可能成功的实践路径的制约。与某些人主张“告别革命”的观点不同^②,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少数资产阶级精英“激进主义”政治理想和实践的产物,而是20世纪初中国深重民族危机和尖锐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必然结果。就这个意义而言,辛亥革命爆发的具体形式和时机虽然带有偶然性,但在别无其他选择和面临帝国主义巨大的外来压力的前提下,中国人民要诉诸暴力革命的手段成为中华民族及自身命运的主宰则显然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③。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史上的地位就如同俄国1905年革命、法国1830和1848年革命等一样,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预演和必要的过渡阶段。

辛亥革命顺乎世界潮流,高举民主主义和民族独立的旗帜,以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为基本手段,一反中国历史上以往改朝换代的政治限于易姓革命的传统。作为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而且,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领导者始终坚决主张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一纲领,这种对革命建国的自觉意识是以前历次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反封建农民革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等都不具备的。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变革政体、引入民主政治因素等方面外,辛亥革命与其后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存在许多十分紧密的联系。这些联系具体表现在:首先,从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完整体系上看,辛亥革命更大的价值在于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中国革命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矛盾问题,并促使人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努力寻求超越辛亥革命所获得答案之外的更有效的解题之道,而这恰恰是留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其次,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更广泛、更彻底革命的预演,使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得到了初步的检验,从而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者们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切身感受到,单凭任何一个阶级的力量进行孤军奋战都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革命也只有走到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阶段,才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竟的事业。再次,辛亥革命在一些具体革命原则和策略方面也对以后的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比如辛亥革命就首开了以革命政党来领导革命的先河,而其后深入发展的革命实践更是充分证明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先进政党领导核心^④。由于对上述问题认识的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①潘荣:《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转折点——兼析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认识的某些偏见》,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②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1期。

③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④胡盛芳:《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建设的经验教训》,载《党校论坛》1990年第4期。

主义革命少走了许多弯路。此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来自和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完善的革命纲领是对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继承发扬等,都表明了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当然,辛亥革命还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世界意义。作为近代中国和亚洲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代理人的胜利为同时期亚洲和世界范围内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榜样和经验教训方面的借鉴。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也随之成为周边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者的根据地,这标志着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掀开了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觉醒的新篇章,由此成为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

除了上述提到的辛亥革命的直接积极影响之外,它给我们带来的其他一些启示也是中国革命史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经由辛亥革命的实践,至少证明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一) 只有由中华民族自身主导的革命才能救中国

这一结论具体包括了两层含义,首先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由受压迫民族本身主导完成,不能对帝国主义势力存在任何幻想或寄望于其他外部势力的介入来实现革命目标。辛亥革命所遵循的基本上依靠本民族力量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的基本方针,不仅引导中国最终走上了独立自主和富强文明的道路,而且也教育了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使他们更有可能看破帝国主义的虚伪性,对本民族人民的革命性产生更大的信心。其次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外来经验和本国具体国情的关系。不可否认,辛亥革命的发生和部分成功的确受到了此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直接影响,但它结果的局限性又表明,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可能依靠任何既有的外国模式来实现。事实上,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孙中山后来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变革应当学习西方、借鉴西方,但根本目标还是要超越西方,不为后者所同化。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实践中无法在照搬西方模式而为帝国主义所掣肘,和在深入群众、将外来经验同本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这两条道路中间作出决然的取舍,但由辛亥革命实践所引发的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毕竟启发了更先进的革命领导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去更科学、系统地规划中国革命的前景。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之前中国现代化的模式主要是接受理解外来的现代化理念,以此颠覆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因素;而革命后自然转变为更多地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条件,规划符合中国革命自身需要的现实方案。

(二) 实现现代化必须扫除国家层面的制度障碍,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国家政权问题。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代表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动政治势力从来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需要和所提供的现实时代条件等已经不可能选择暴力革命之外的任何一种其他方式来扫除现代化进程上的障碍^①。就其实质而言,辛亥革命未能完全成功并不是由于它选择对反动势力采取暴力革命斗争和武装夺权的手段,而是由于革命的领导者没能始终坚定地沿着彻底的、毫不妥协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

当然,辛亥革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现代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国家政体上的根本变革,而且也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内的全方位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就现代国家建构而言,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任务就表现为在摧毁封建一统的基础上重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也正是由于这一任务的空前复杂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一次暴风骤雨式的短暂革命彻底地完成革命目标。辛亥革命在打破封建一统局面之后并未能马上代之以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基础上的政治统一,就证明了仅仅在国家制度层面的革命和变革中,就存在许多复杂多变的因素。其次,在经济领域内,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就不可能彻底地解放出受到半殖民地半封

^① 朱永嘉:《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兼评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载《探索》2011年第1期。

建经济秩序所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更不可能让更多的社会阶级阶层平等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次,与政治经济领域的现代化相比,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任务尽管更加琐碎,但却在事实上起到了影响和制约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然,其中传统因素的稳定性也远较前两者为大,这就更需要革命者确立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在与最广大基层群众的紧密结合中完成这些复杂而必要的革命任务。

(三) 表明中国革命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辩证否定中不断完善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中,辛亥革命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开创性历史意义,所指的就是在客观评价辛亥革命成败得失的同时,更应当注重以其为一个新时代起点,启发了当时的中国人在曲折的实践中对许多此前未曾遇到过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更应当注重以其为切入点,正确认识和评价整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史的价值。

从感性的认识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利”的器物之便到发掘其背后的先进制度因素,以及进一步思考塑造和支撑制度的深层原因,近代中国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一个对前一时期的变革成果否定和超越、进而思考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辛亥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和超越了改良主义的方案,使人们意识到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变革的必要性,而它的失败又促使人们向超越制度的层面进一步思考,从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基础上去发现新变革的起点^①,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辛亥革命后的爱国者们不仅在政治领域继续与本国和外国的反动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同时也以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为全民族启蒙为使命,启动了新文化运动等变革进程,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荡涤着封建主义的残余,为现代民主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在中国扎根创造全新的心理文化土壤。

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旧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反映的是不同时代追求进步的中国人不断实践探索,修正选择道路的努力。正是在吸取了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具体而言,后来的革命者从辛亥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应该更好地解决革命对象问题、统一战线问题、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问题等经验教训,由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代替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完全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幻想,超越特定阶级的范畴,彻底地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定位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依靠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依靠党掌握的可靠的革命军队,立足于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敌人毫不妥协,终于完成了辛亥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从一个更长的周期上看,辛亥革命所开启的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元,也是一个中国革命领导者和各族人民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深化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和运用能力的过程。仅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就堪称为总结创建中国特色的民族民主革命经验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性起点。

客观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之处都是由当时中国具体国情所能提供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仍然需要其后 3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获得最终胜利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既不必苛责没能彻底完成革命任务的革命先驱者们,也应该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同时将其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给予尽量客观准确的评价。

■ 作者简介:师泽生,本名杨海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林 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ZZ001)

■ 责任编辑:叶娟丽

① 宋保国:《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载《前沿》2001 年第 8 期。